

释守仁《梦观集》刊刻与流传考论*

李舜臣

内容摘要:明初诗文僧释守仁的《梦观集》,在明代出现过两种刊本:一种是建文三年刊本,即日藏抄本的底本;另一种是约永乐至天顺年间的抽改本,南京图书馆藏有前三卷。南图藏本在建文刊本的基础上抽改了卷首序文和书末题识,将书前序作者方孝孺易为宋濂,将书末祥彰题识的落款由“建文二年岁在辛巳季春”改为“洪武岁在辛巳季春”。但研究者不识,误以抽改本为原刊本,以日藏抄本的底本为抽改本,以序作者为宋濂。《梦观集》两种刊本的细微变化,是永乐“革除”建文年号和“禁书令”的直接反映。

关键词:释守仁 《梦观集》 方孝孺 宋濂 “革除”建文年号

释守仁乃明初著名诗文僧,世传其与释德祥因诗贾祸之事,具载于郎瑛《七修类稿》、蒋一葵《尧山堂外纪》等野史笔记中。但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力辨其非,以为“野史流传不足信也”^①。因二僧诗文集国内罕见全本,“诗祸”真伪,颇难决断^②。近年,学者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发现了释守仁《梦观集》六卷抄本,所载诗歌可略观其行迹,足资考证此桩文字狱。日藏抄本最早由黄仁生披露^③,钟彦飞继而全面叙录了现存各种版本,其文献价值初步得到彰显^④。不过,《梦观集》的刊刻与流传颇为曲折,疑义犹多,尚待认真发覆。

* 本文为 2020 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明清释家别集整理与研究”(20&ZD269)阶段性成果。

①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闰集《止庵法师祥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第 679 页。

②笔者在《钱谦益〈列朝诗集〉编选释氏诗歌考论》(《文学遗产》2015 年第 3 期,第 114-124 页)一文中曾涉及此问题,但当时尚未见到《梦观集》六卷全本,故研讨不深。

③黄仁生:《日本现藏稀见元明文集考证与提要》,岳麓书社,2004 年,第 48-49 页。

④钟彦飞:《日藏释守仁〈梦观集〉抄本考论》,《文献》2019 年第 3 期,第 69-78 页。下引该文,不另注。

一、《梦观集》的序作者乃方孝儒而非宋濂

守仁(?-1391)字一初,号梦观,富阳人。早岁从杨维禎游,遭时不偶,遂剃发出家,发迹四明延庆寺,元末住持灵隐寺。洪武四年(1371),与宗泐、来复等十高僧同召入京,洪武十五年(1382)授僧录司右讲经,三考而升右善世。母歿,奉旨奔丧,赐镒殓殓。洪武二十四年(1391)主天禧寺,示寂于寺。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载其生平较详^①。据《千顷堂书目》《明史·艺文志》等明清书志,释守仁惟有《梦观集》六卷传世^②。

正如钟彦飞所言,释守仁《梦观集》今存三种版本:一为南京图书馆藏明刊本(以下简称“南图刊本”),存前三卷;一为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抄本(以下简称“北大抄本”),存前三卷;一为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谦斋周良抄本(以下简称“日藏抄本”),六卷全。三种版本的正文前皆冠有一序,曰:

五谷所以疗饥,而水所以御渴。人皆知五谷之用重于水也,而不知五谷非水则不能成,生物之功,反有急于五谷者。有水而无谷,则鸟兽之毛血,草木之肤实,或可治以养生,未有无水之地能久存而不死者也。惟文与道也亦然。天下皆知道之贵于文也,宁知道非文则无所寓,而文有急于道者乎?周衰以来,老庄诸子发其术,著书者以百计,惟佛氏入中国稍后,而其术最奇。其闳诡玄奥,老庄不能及之。然而,世之学者常喜观诸子之书,至于佛氏之说,非笃好者,多置不省。何哉?岂非诸子之文足□(以)说人,故人尤好之邪?佛氏之意,盖亦深远矣,惜其译之者不能修其辞也。以其所言之详,使有能文者译其辞,命文措制与诸子相准,虽阻遏诸子而行于世可也。其动物诱民,奚止若斯而已哉!盖知道而不能文,其失芜昧而道不章;能文而不知道,其失荒鄙而不足以立教,兼通而并至者,非奇杰之士不能也。余行四方,与学佛者游颇众。其以知道自名者,则缀缉俚俗之说以诋诬其徒,污秽烦褻,近于俳戏之语,谓道当若是,而不必乎文。或病其然,则绝去其教不省,而雕斲丽语曼辞以取容于世,心甚厌而非之。人咸谓余不喜佛氏,亦有以致之耳。今年道钱唐,遇普福大师仁公一初,于其道甚习,出其文若诗。览之,持论深醇而不杂以它说,为辞富丽而不流于诡异,吾儒之工于言者殆不能过。余喜与之值,师亦乐与余言,迥然相宜,犁然相谐,欢然忘其所从之

①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闰集《梦观法师仁公》,第677页。

②黄虞稷撰,瞿凤起、潘景郑整理:《千顷堂书目》卷二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97页。按,是书作“梦觉集”,“觉”应为“观”之误。张廷玉等:《明史》卷九九《艺文四》,中华书局,1974年,第2491页。

殊、所居之远也。夫道固无穷，文亦无穷，能言斯道者，岂特古之人哉？暗乎而非隐也，茫乎而非诞也，杳乎微乎而非昧也。□（试）归而求之，余不有得焉，则师得之矣。^①

除略有脱字、异文外，三者所录正文内容大抵相近，但篇名、落款不同。南图刊本、北大抄本皆题名“梦观集序”，末署“洪武廿有二年岁在己巳春二月望日，前翰林学士承旨嘉议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兼太子赞善大夫金华宋濂序”；日藏抄本题名“梦观文集序”，末署“天台方孝孺序”，未及年月。

钟彦飞以南图刊本为明初刻本，且落款年月与其推断的日藏抄本《梦观集》六卷所收作品最晚系年（洪武二十二年）相吻合，遂“臆定序文作者为宋濂”，并以为“此序不见于现存宋濂各集，亦为集外佚文”。日藏抄本抄于永禄十年（详后文），即明隆庆元年（1567）；而南图刊本从行款看的确很接近明初刻本风格，应早于抄本百余年。类似这种刊本在前，抄本在后的情形，依据常识，似应以南图刊本为确。

然略作考察，却发现此判断颇有问题。首先，南图刊本、北大抄本序末落款“洪武廿有二年岁在己巳”，即1389年，而宋濂卒于洪武十四年（1381），何有作序之可能？其次，序中称“人咸谓余不喜佛氏”，亦非宋濂口吻。宋濂自称“永明后身”，号“无相居士”^②，又说“我生本是菩提种，误婴世网未解脱”^③。明末莲池大师曾辑其部分涉佛文，名曰《皇明护法录》。宋濂笃信、护持佛教，元末明初文人殆无有出其右者。钱谦益曾评曰：“文宪三阅大藏，入海算沙，有如指掌，在儒门中，当为多闻总持。”^④翻检宋濂存世诗文，几未见有诋佛言论，焉可说出“人咸谓余不喜佛氏”之语？

那么，日藏抄本《梦观文集序》署名方孝孺，可否采信？方孝孺（1357—1402）字希直，一字希古，号逊志，学者称“正学先生”，浙江宁海人，官至翰林侍讲及翰林学士。建文四年（1402），因拒拟诏书而被朱棣磔于市，并夷十族，一门死难者达八百余人。孝孺虽从学于宋濂，视佛禅却判然二途，尝言：“仆有志于古人之道久矣，今之叛道者莫过于二氏，而释氏尤甚。仆私窃愤之，以为儒者未能如孟韩，放言驱斥，使不敢横，亦当如古之善守国者，严于

①按，此序依日藏抄本录入，文中脱字，则据南图刊本补。参见钟彦飞：《日藏释守仁〈梦观集〉抄本考论》，第76页。

②宋濂：《宋濂全集（新编本）》第二册《潜溪后集》卷八《血书〈华严经〉赞（有序）》，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415页。

③宋濂：《宋濂全集（新编本）》第五册《芝园续集》卷八《夕佳楼颂》，第1787页。

④钱谦益著，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初学集》卷二八《宋文宪公护法录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862页。

疆域斥候,使敌不能攻劫可也。”^①孝孺之辟佛,虽不似韩愈之峻烈,却亦引起丛林内外“毁汕万端”,序中所称“人咸谓余不喜佛氏”,颇合其人其情。不过,孝孺虽力主排佛,但仍与浮屠往来,尝作有《送浮屠景晖序》《赠瑄蕴中序》《题灵隐寺碑后》诸文。检《方孝孺集》卷十《答郑仲辩二首》其二云:“去年王仲缙至蜀,承手帖。谕以近读佛书自遣,心切疑之,以为特戏言耳。及朝京师,于一初处,见所往还书,援佛氏之说甚详,向慕于彼者甚至,然后知足下之果入于佛也。”^②“一初”应即守仁,可见孝孺与释守仁曾相往还,应有作序之可能。

今人吕诗尧云:“从方孝孺的著作看,他并没有对佛、道教本身以及其中高人进行鄙薄,反而持着谦卑驯顺的态度和当时的佛教名流、道教真人进行书信往来,并且对这些人的学识修养褒扬甚多。”^③此为识者之论。《梦观集序》之辟佛,语非激烈,惟论浮屠氏不能文道相贯,致使“知道而不能文,其失芜昧而道不章;能文而不知道,其失荒鄙而不足以立教”,否则“其动物诱民,奚止若斯而已哉”,倒有几分惋惜之意。而对于释守仁“持论深醇而不杂以它说,为辞富丽而不流于诡异”的文风,则深自赞赏。此种旨趣、风格颇符契孝孺其他涉佛文。

总之,以《梦观集序》的落款及其旨趣、风格而言,笔者以为:此序作者为方孝孺而非宋濂,宜以日藏抄本为是。至于日藏抄本六卷皆诗无文,序题却称“梦观文集序”,盖此序原本方孝孺为释守仁文集所作,刊者移作诗集序。此种现象在古籍刊刻中并不少见。

二、南图刊本非原刊本及书序作者致误的原因

释守仁《梦观集》之序,日藏抄本和南图刊本何以出现不同的署名^④?钟彦飞推测说:“日藏抄本题方孝孺或因所见明刊本署名叶脱落而误补。”但细查二本署名叶(见图1和图2),这种推测基本不成立。日藏抄本和南图刊本的署名叶皆非单独成叶:前者序文凡三叶,署名叶与正文108字同叶;后者署名叶则含正文“则师得之矣”五字,若脱去署名叶,则日藏抄本不应有此5字。细校此二版本,凡南图刊本脱字、漏字处,日藏抄本一般亦空缺。如卷

①方孝孺著,徐光大大点校:《方孝孺集》卷十一《答刘子传书》,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403-404页。

②方孝孺著,徐光大大点校:《方孝孺集》卷十《答郑仲辩二首》其二,第355-356页。

③吕诗尧:《明初儒者方孝孺的辟异端思想》,《世界宗教研究》2016年第4期,第32-37页。

④按,“北大藏本”不知具体抄录的年代,因不关本文宏旨,暂不论。

二五古《道心堂为彭司农赋》所脱字句,南图刊本有“湛然明镜中,彻见□□□”“纷纷事外驰,逐物不□□□”“□□心境空,明月在秋水”六句,日藏抄本亦脱此八字,未敢擅自补入。因此,日藏抄本擅自定夺序作者的情况可以排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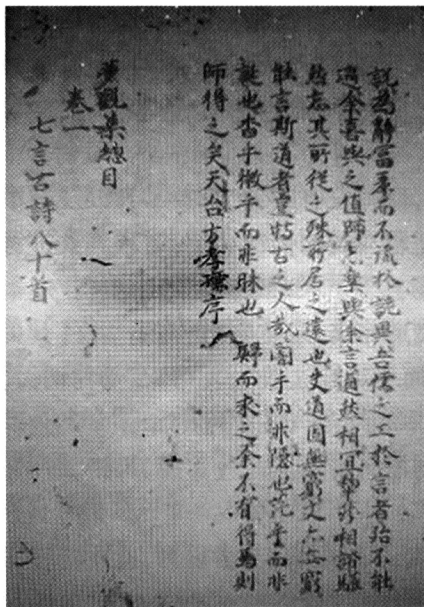


图1 日藏抄本署名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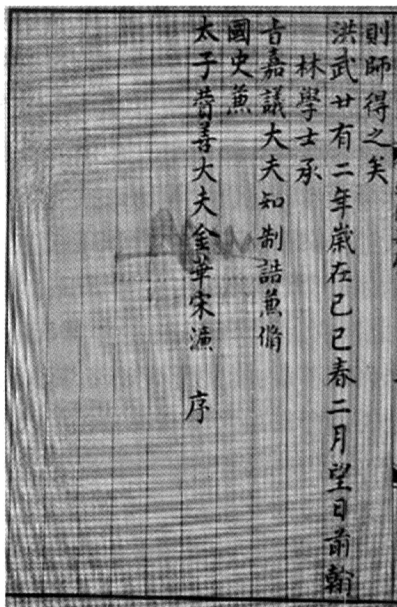


图2 南图刊本署名叶

南图刊本因脱去后三卷,具体刊刻年代不易考实。钟彦飞认为此本“当即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三十四所载汪鱼亭(宪)旧藏明初刊六卷本”。此论诚是。检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三四云:“此明初刊六卷本。首题‘梦观集卷一’,当是专刻诗集。有洪武廿二年金华宋濂序,有‘太原叔子藏书记’‘秘篋抱书抵百城’‘汪鱼亭藏阅书’各印。”^①“太原叔子藏书记”乃清

①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三四,《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清代卷第三册,中华书局,2006年,第815页下。需要说明的是,元明时期,曾出现过两种同名异书的《梦观集》,一为释守仁《梦观集》,一为释大圭《梦观集》,且二人皆号曰“梦观”,颇易混淆。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二三《守仁》辨曰:“梦观道人亦有二,一晋江人,名大圭;二富阳人,名守仁,石仓曹氏乃误合为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第736页)日本书志如《内阁文库汉籍分类目录》(内阁文库,1956年)、《改订内阁文库汉籍分类目录》(内阁文库,1971年),均将释守仁《梦观集》抄本与崇祯九年大圭《梦观集》刊本误为一书,标为“二十四卷,元释大圭,明崇祯九年序刊”。关于此一问题,黄仁生和钟彦飞均有所及,林翠霞《释大圭〈梦观集〉版本考略》一文辨之更详(《福建史志》2020年第6期,第26-29页)。

人王闻远(1663-1741)藏书印,“汪鱼亭藏阅书”为汪宪(1721-1771)藏印,可知是书曾为王闻远、汪宪递藏。清末丁氏八千卷楼藏书散出,多归南图。今核此本,所钤之印与丁氏著录吻合,确属八千卷楼旧物,惜仅存前三卷。

不过,南图刊本或非惟一刊本。清末方濬师《蕉轩续录》卷一曾提及《梦观集》:

余从海舶贾人购得《梦观集》六卷,释如兰编次。按:梦观禅师名守仁,富阳人,发迹四明延庆寺,住持灵隐。洪武十五年,征授僧录司右讲经,甚见尊礼,三考升右善世。母歿,赐缣殓殓。二十四年主天禧,示寂。方正学先生撰其序云……此叙《逊志斋集》中无之,盖先生文章遗失者多也。^①

方濬师(1830-1889)字子严,号梦簪,安徽定远人。同治八年(1869)至光绪五年(1879)间,任分巡广东肇阳罗道。方氏明确称所购《梦观集》的序作者为方孝孺,且目验过方氏《逊志斋集》,断定为其中佚文,其细致若此,断无误书之可能。

方濬师所购之本,后归刘承幹嘉业堂。《嘉业堂藏书志》曾著录此书,首录方孝孺序,次录方濬师题记。方氏题记云:

是集六卷,为古春所编次,前有方正学先生序文,《逊志斋集》中遗失未刊。竹垞《明诗综》列古春而屏梦观,殊不可解。《四库》正、存目中亦未著录。癸酉在羊城购之日本估船,展读一过,古近体皆有神韵,雄壮不及道斯(引者按,应为“斯道”,即姚广孝)而恬淡过之,可以别人品之优劣焉。集中有《送道斯之北平》作,颌联云“朝端政选无双士,殿下亲征有道僧”,意殆有所规欤?光绪改元十月既望,濬师重读并记。元释大圭,字恒白,姓廖氏,晋江人,其集亦曰梦观。^②

此段文字应是方濬师写于书上的题识,异于《蕉轩续录》。方濬师再次明确序作者为方孝孺,并称此本乃同治十二年癸酉(1873)购于日本估船,时方氏正分巡广东肇阳罗道。所录《送道斯之北平》即《送衍斯道之北平》,见于今存各本《梦观集》卷三。《嘉业堂藏书志》后又有董康题识云:

明释守仁撰。建文时刻本。黑口,双边。分体编次。古诗雄健高蹇,律诗典丽。杨铁崖《东维子集》《送兰仁二上人归天竺序》,谓皆有用之才,授之以《春秋》史学,兵兴潜于释,又云能以宗乘与吾圣典合两为一。集中《铁崖先生挽诗》有云:“旧业门生今几在,下车空拜马陵坟。”

①方濬师撰,盛冬铃点校:《蕉轩随录·续录》,中华书局,1995年,第539-540页。

②缪荃孙、吴昌绶、董康撰,吴格整理点校:《嘉业堂藏书志》卷四,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677页。

是为先生入室弟子，濡染有自，宜其迥出恒流也。卷末题志三行：“建文三年岁在辛巳季春，四明延庆住山门人祥彰刊行，长汀胡口义刻。”黄虞稷《千顷堂书目》作《梦觉集》，盖偶误。有“后正之斋藏书图记”“佐伯文库”“广东肇阳罗道关防”诸记。（董稿）^①

《嘉业堂藏书志》乃缪荃孙、吴昌绶、董康三人合撰。此段文字后既题“董稿”二字，则应出自董康（1867-1947）之手。董康明确称此本为“建文时刻本”，所述版式与南图刊本相同，所录卷末题志则同于日藏抄本。董康并没有对方濬师题识中所载方孝孺序提出疑异，盖所见正是方孝孺序。“后正之斋藏书图记”，不知何人藏印；“佐伯文库”则是日本九州佐伯藩毛利高标（1755-1801）私家藏书室，建于天明元年（1781），以收藏汉籍为主。明治维新时期，日人锐意变法，摒弃传统古籍，“佐伯文库”所藏汉籍大量散出。李希圣《雁影斋题跋》即称：“光绪初元，日本方一意变法，视旧籍如土苴。”^②方濬师正是藉此机缘而获《梦观集》，惜今已不明下落，但方氏题识和董康所撰藏书志表明：这本曾流落于东瀛的《梦观集》六卷，应为建文刊本无疑，序之作者为方孝孺，不同于南图刊本。钟彦飞以为，方濬师所购“《梦观集》六卷抄本，为日本转抄本”，这一判断略显武断，盖未见《嘉业堂藏书志》中的相关记载。

方濬师所购之本是否为日藏抄本的底本？日藏抄本《梦观集》卷末有题识云：“维时永禄十岁岁舍丁卯卯月之末，借明国印本于琛甫小友，而遮眼者数日，遂不获已，写乌丝以为后来学助云。季夏十有二日，就妙智精庐南檐下毕功。谦斋周良六十七龄志焉。”此本乃由谦斋周良（1501-1579）抄于永禄十年（1567）。谦斋周良法名周良，字策彦，号谦斋，俗姓井上。九岁出家于嵯峨天龙寺，师事心翁周安。嘉靖年间，先后以遣明副使、遣明正使的身份两度入明，受遇甚隆。谦斋周良耽于汉诗文，为五山文学末期巨匠，著有《策彦和尚初渡集》《再渡集》《谦斋诗稿》等诗文集。谦斋周良称，所抄《梦观集》之底本为“明国印本”，其序作者既署方孝孺，则底本应为“建文刊本”。不过，此“建文刊本”并非谦斋周良携归之物，而是借自“琛甫小友”，其人待考。

综上所述，释守仁《梦观集》在明代曾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刊本：一是方濬师所购建文刊本，二是今藏于南京图书馆的明刊本。前者已不见存，后者仅存前三卷，但揆诸相关文献，可知两者的版式大致相同，惟序作者的署名不

^①缪荃孙、吴昌绶、董康撰，吴格整理点校：《嘉业堂藏书志》卷四，第678页。

^②李希圣：《雁影斋题跋》卷首《自序》，《中国历代书目题跋丛书》第九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15页。

同。那么,何以在相近的版式中出现同一篇序署名不同的现象呢?笔者思虑再三,未得其解,一夕细勘南图刊本,再联想到永乐朝严密之“文网”,始悟南图刊本应是在建文刊本基础上抽改序文后的再刊本。

南图刊本的序文与正文,虽行款、版式大抵相同,但仍有细微差别:正文的边框墨色更浓,序文则略显细小;正文字体拙朴,缺笔处甚多,序文则更显圆润、清晰,几无缺笔。这提示我们:南图刊本的正文与序文可能并非同时雕印而成。

明成祖朱棣即位后,颁行了酷烈的文字禁令。屠叔方《建文朝野汇编序略》称:“缅惟文皇帝入继大统,党禁严迫。凡系诸臣手迹,即零星片札,悉投水火中。惟恐告讦、搜捕之踵及,故其事十无一存。”^①方孝孺为旧臣魁首,其著述自不可免,“永乐中,藏孝孺文者罪至死”^②。永乐三年(1405)十一月,庶吉士章朴因家藏其诗文而被斩。方氏所撰《周易枝辞》《周礼考次目录》《宋史要言》《基命录》《文同》等皆毁而不传,其余相关文字亦多被铲削、涂墨。例如,建文三年(1401),方孝孺曾手自缮写宋濂《宋学士续文萃》,但后来重印时,其中“若正学父方愚庵先生墓版文,及《送方生还宁海》诗与郑柏后跋皆非旧。凡涉方氏者,概不敢书名,第曰某某,即内府本用墨涂乙之意也”^③。永乐朝之“文禁”大致持续至天顺年间,临海人赵洪任始辑孝孺诗文侵梓以传。综合以上因素,笔者谨慎推断:释守仁《梦观集》首刊于建文年间,不久即逢“靖难之变”,刊刻者抽改了建文刊本之序,将序之作者方孝孺易为宋濂,以避文网。

那么,何以将《梦观集》的序作者托名于宋濂,而非他人?盖以宋濂为孝孺师,而孝孺又尝为宋濂代作有大量文章。唐尧臣曾列举宋濂《潜溪集》中“如送李参政、王文炯、李生及《方氏族谱序》《越国公神道碑》”等文,在方孝孺《逊志斋集》邑本各题下均注明“代太史公作”,实为孝孺作也^④。抽改者或以此达成乱真之目的。

三、俞宪、毛晋书“洪武辛巳”与“革除”建文年号

嘉、隆年间,无锡俞宪编有《盛明百家诗选》三百卷,以人为集,诸集前各

①屠叔方:《建文朝野汇编》卷首《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51册,齐鲁书社,1996年,第2页下。

②张廷玉等:《明史》卷一四一《方孝孺传》,第4020页。

③林佶:《宋学士续文粹题识》,《宋学士续文粹》卷末,黄灵庚、陶诚华主编:《重修金华丛书》三编第13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629页。

④唐尧臣:《重刊逊志斋集凡例》,《方孝孺集》附录,第1021页。

冠以小序。所辑《释梦观集》一卷,收诗凡199首,前有俞氏题识云:“按,梦观和尚法名仁,发迹四明延庆寺,高皇时供奉南都,盖专攻诗词而托佛教以用世者。其诗各体具备,凡六卷,为富春释如兰编次,长汀胡公义铨梓,洪武辛巳住寺门人延彰尝识于末简。今刻仅采其什一云。隆庆己巳五夏,锡山忘言老人俞宪氏识。”^①俞宪所辑之诗,俱见于日藏抄本《梦观集》六卷,表明他所见应为六卷全本;所称延彰(应为“祥彰”,俞氏偶误)题识,亦可见诸日藏抄本。原文如下:

昔慈云大师云:“吾或从事于文墨,非以废道沽名,盖有不得已也。”先师梦观和尚蚤工于词咏,其亦不得已资黼黻焉耳,岂特尚声韵之峻哉?于是板刻遗稿,以共道者。时建文二年岁在辛巳季春,四明延庆住持门人祥彰谨识,长汀胡公义刻。

“建文二年”乃庚辰年,“辛巳”为建文三年,应系抄者谦斋周良误“三”为“二”,实“建文三年”。然俞宪题识称“洪武辛巳住寺门人延彰尝识于简末”,而不作“建文辛巳”,则显非笔误,因为洪武并无“辛巳”纪年。

崇祯年间,虞山毛晋所编《明僧弘秀集》卷二选有释守仁诗123首,并录有祥彰题识,内容与日藏抄本基本相同,落款却亦署“时洪武岁在辛巳季春”^②。《明僧弘秀集》与《盛名百家诗选》所选释守仁诗,虽重复率较高,且编排顺序皆依原本,但《明僧弘秀集》所选七古《清晖楼歌》《采菊篇为郑生作》《来泓亭为姚宗文赋》《白云楼诗为滋上人赋》等十馀首,不见于《盛名百家诗选》,这表明毛晋编选释守仁诗并非抄撮《盛名百家诗选》而成。易言之,毛晋将祥彰的题识署为“时洪武岁在辛巳季春”,并非受俞宪的影响,而可能来自于同一版本。这个版本,笔者以为就是上文推断的永乐至天顺年间的抽改本,亦即南图刊本。

那么,抽改本何以要将祥彰题识的落款由“时建文二年岁在辛巳季春”改为“时洪武岁在辛巳季春”呢?

朱棣即位之后,不仅禁行建文旧臣手迹,且削其行事之迹,诏令以建文四年为洪武三十五,明年为永乐元年,此为明史上著名的“革除”建文年号之始。关于“革除令”之始末,及其实施力度等问题,自明中叶以来,学界即聚

^①俞宪:《盛明百家诗选》后集,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五辑第一百册,黄山书社,2013年,第502页下。

^②毛晋辑,李玉栓校点:《明僧弘秀集》卷二,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82页。

讼纷纭^①。王世贞、顾炎武等以为朱棣仅将建文四年并入洪武三十五年,并未明确颁行全面革除建文年号的禁令,惟史臣曲解圣意,不书建文年号。例如顾炎武云:“故(建文四年)七月壬午朔诏文一款一‘今年仍以洪武三十五年为纪,其改明年为永乐元年’。并未尝有革除字样,即云革除,亦革除七月以后之建文,未尝并六月以前及元二三年之建文而革除之也。故建文有四年而不终,洪武有三十五年,而无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年。夫实录之载此明矣。自六月己巳以前书四年,庚午以后特书洪武三十五年,此当时据实而书者也。第儒臣浅陋,不能上窥圣心,而嫌于载建文之号于成祖之录,于是创一无号之元年以书之史。使后之读者彷徨焉不得其解,而革除之说自此起矣。”^②顾氏所论自有道理,然建文四年七月的诏令,使朝野上下莫不行革除之实,以避讥嫌。朱彝尊曾见霍山庙建文元年碑,撰跋文曰:“盖自燕师靖难之后,四年之政事,悉行革除,旧典遗文,去之惟恐不尽,乃普天之下尚留此一片石存人间。”^③朱氏精于金石文史,游历甚广,凡丛祠、荒冢残碑之文,莫不搜剔考证,犹以此碑为稀罕物,足见建文事迹、年号几被革除殆尽。

“革除令”之酷烈,同样反映在书籍刊刻之中。很多建文年间刊刻的书籍,凡涉及建文年号者,多被铲削涂墨,或抽改修正。例如,元诗选本《元音》十二卷,前有曾用臧序,落款为“辛巳九月下泮,而空其年号两字”,四库馆臣以为“殆以靖难革除,铲削其板,盖犹明初本也”^④。又如,明李文秀撰《钟鼎逸事》一卷,前有王骥、王汝玉等序,王骥序题“洪武壬午”,王汝玉序则书“元年十二月”,铲去年号二字。四库馆臣以为“盖汝玉作于革除以前,而刻于革除以后,故削建文年号。骥序作于燕王篡立以后,故奉仍称洪武三十五年之诏耳”^⑤。建文年间刊刻的书籍,经靖难之役,复罹“革除”删汰,传于今者几稀。潘景郑、顾廷龙二先生《明代版本图录初编》,广搜版本,备载历朝书影,而独缺建文本,即反映了此一事实。

①关于这些问题的研究综述,可参看杨永康《朱棣“革除”建文年号考——以孔尚任所藏〈燕王靖难札付〉为证》(《文史哲》2018年第5期,第139-152页)以及汪崇武《奉天靖难记注》(商务印书馆,1948年)等论文、论著。

②顾炎武著,华忱之点校:《顾亭林诗文集》卷一《革除辨》,中华书局,1983年,第9-10页。

③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五一《霍山庙建文元年碑跋》,《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1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06页上。

④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九“《元音》十二卷”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第1713页。

⑤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六〇“《钟鼎逸事》一卷”提要,第539页。

建文年号在国史中得以恢复,大抵在万历二十五年(1597)前后。嘉、隆年间俞宪编选《盛明百家诗》将“建文辛巳”改为“洪武辛巳”,或为“革除令”影响下的个人行为。但是,毛晋编选《明僧弘秀集》的崇祯年间,“革除令”日已松弛,则毛晋断无擅自更改之由。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断:毛晋的选诗底本——永乐至天顺间的抽改本《梦观集》,如同正文前的序文一样,书后祥祲的题识亦被抽改重印,其落款由“时建文二年岁在辛巳季春”改作“时洪武岁在辛巳季春”。惜南图刊本已佚后三卷,若有幸能重见天壤,笔者自信,书末祥祲题识的落款定为“时洪武岁在辛巳季春”。

四、结语

综上推考,释守仁《梦观集》的刊刻、流传历经波折。是书初刊于建文三年,不久因“靖难之变”被禁行,刊印者遂将书前序文和书末题识抽改重印,序作者由方孝孺改作宋濂,题识落款由“时建文二年岁在辛巳季春”改作“时洪武岁在辛巳季春”,以此达成在政治高压之下存留书籍的目的。

建文刊本传本甚少,仅少量流入日本。清末方濬师偶从日本估船回购一部,后转归刘承幹嘉业堂,今不明下落。所幸的是,永禄十年日人谦斋周良曾手自缮写一部,现庋藏于日本国立公文书馆,是目前所知惟一的《梦观集》全本。抽改本则主要流传于国内,俞宪《盛明百家诗》、毛晋《明僧弘秀集》等诗歌选本多据此而选政,今仅南图藏有前三卷,北大图书馆藏前三卷抄本。

释守仁《梦观集》不特文献价值可贵,考察其刊刻、流传过程亦良多启示:其一,古籍成书、刊刻及传衍甚为复杂,不可仅凭常识而轻下判断,不可概以刊本、抄本或成书先后而定其优劣、真伪;其二,古籍研究除必备扎实的专业基础,“历史想像”之意识亦不可或缺,尤其是“文网”严厉的特殊时段,诸本所存细微之差异乃至“疏误”,常寄寓着编刻者良苦用心。研究者须廓清历史迷雾,审慎辨析差异、疏误的原因,如此或可还原问题的真相。

【作者简介】李舜臣,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佛教文学、古籍整理与研究。